

【差异与分层】

中国 EGP 阶层分类的操作化过程

——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为例

侯利明 秦广强

内容提要:在社会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中,EGP阶层分类是最常用的阶层分类。如何把中国的标准职业分类直接转换为国际比较可能的EGP阶层分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当前的国内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讨论。对此,本研究基于甘泽博姆和特雷曼的方法,给出了具体的转换原理和转换程序。这一工作不仅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支持,也有利于把握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

关键词:阶层分类;阶层转换;转换方法;EGP;ISCO88

一、前言

7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数线性模型的出现,社会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Grusky and Hauser, 1984; Yamaguchi, 1987; Ganzeboom et al., 1989;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在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领域中,其最核心的问题是:国家间父代阶层对子代阶层的传递模式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因此,在进行比较研究之前,如何对不同国家间的阶层进行合理的整合,是社会流动研究中最基本的课题。在第二代社会流动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作为测量不同国家职业声望指标的标准化方法被广泛用于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中。该指标最早由甘泽博姆、格拉芙和特雷曼(1992)提出,他们在邓肯的美国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通过对16个国家的教育和收入指标进行国际标准化操作,得到了能够进行国际比较的标准职业声望指标。由于该指标建立在各类职业的声望得分以及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回归方程之上,因此该指数是一个连续性指标,而非分类性指标。尽管该指标所反映的社会位置较为准确,但是由于连续性特性导致既无法捕捉到职业的特性(例如,工作的自律性,收入,福利保障,晋升机会等),也无法把握阶层地位与个人意识、行为特性之间的关系,因而饱受批评(Grusky, 2001)。因此,如何以阶级论为前提,明确阶层分类的界限,成为了社会流动研究中最基本的课题。

作者简介:侯利明,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秦广强,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7M613095)。

近年来,EGP 阶层分类框架成为了国际上广泛认可的分类标准。从社会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也采用了该框架。EGP 阶层框架是根据埃里克森(Erikson)、戈德索普(Goldthorpe)和波托卡雷罗(Portocarero)的首字母来命名的。EGP 阶层图式最早起源于戈德索普对美国社会盛行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质疑,提出这一质疑的根源来自于阶级社会的英国与移民国家的美国之间巨大的流动差异。对此,戈德索普在1974年同霍普创建了一套包含36类具有等级连续特征的职业声望量表——霍普和戈德索普量表(Goldthorpe and Hope, 1974)。在此基础上,他与卢埃林(Goldthorpe and Llewellyn, 1977)基于职业和雇佣地位将36类的职业类别合并为7分类的阶级位置图示,形成了最早的EGP 阶层框架。接着,戈德索普又融入了埃里克森基于技术特征和雇佣地位所设计的社会经济分类框架,将社会阶层统合成为一个基于职业信息和雇佣关系(Employment Relations)的7分类的阶层框架(Erikson et al., 1979)。其中,职业信息包含了个人的工作状况(收入多寡、工作的稳定性和晋升机会等)和技术能力,而雇佣关系则主要表现为个人在组织中所具备的权威和权力地位。他们将具有相似职业的群体合并成一个阶层,然后对雇佣关系进行调整和修正,这一结合决定了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精确位置(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在此之后,这一阶框架开始应用于欧洲7国实施的“当代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比较分析”(CASMI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项目,并对欧洲各国的社会流动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当前中国社会学界对国内阶层分类的方法主要是基于陆学艺(2010)的10分类阶层框架。这种阶层划分的依据是个人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数量,而不是根据雇佣关系。因此,该分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性质不同的三种资源在阶层排名中孰轻孰重的问题(李强,2011)。这一问题不仅导致了经理人员阶层(第二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第三层)更加靠后,也导致了管理阶层的单一化问题(例如,厅级和科级同属一个阶层;大中型私营企业主与中小型私营企业主同属一个阶层)。特别是在市场化、组织化和科层化不断深化的现代中国社会,基于资源分配论的10分类的阶层指标已经逐渐不适用于中国的社会流动研究,而基于组织中权力地位的雇佣关系则逐渐成为中国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雇佣关系正是EGP 阶层框架所强调的影响个人市场地位的决定因素。因此,本研究认为EGP 的阶层框架理论对中国的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这也是本研究关注该问题的目的之所在。

尽管基于权力地位的雇佣关系在中国越来越重要,但是EGP 的阶层分类也不能说完全适用于当代的中国转型社会(刘欣,2007;朱妍,2011)。一些学者也提供了更符合中国转型社会的阶层分类方法(刘欣,2018;林宗弘、吴晓刚,2010)。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使用不同标准的阶层指标可能并不是一个妥善的办法。并且从过往有关中国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来看,这些研究倾向采用统一标准化的EGP 阶层指标(李路路,2006;石田浩、三輪哲,2009)。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国家间社会流动的横向比较,也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流动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

最后,在中国的社会流动研究中,采用EGP 阶层分类的研究并不多见,这可能与EGP 阶层分类的转换程序较为复杂有关。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提供了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在从该分类转换为EGP 阶层分类的过程中,按照甘泽博姆和特雷曼(1996)的方法,除了需要进行职业分组之外,还需要经过8个步骤进行复杂的修正处理。由于2006年之后的CGSS数据并没有直接给出EGP 编码,因此这一繁杂的程序阻碍了不少研究者使用EGP 阶层框架进行

研究。尽管 Stata 软件给出了便利的转换命令包^①,但是这一转换命令并不符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并且其转换原理是什么也没有给出具体过程。因此,国际标准职业编码转换为 EGP 阶层编码背后的原理机制是什么,如何把中国的标准职业编码直接转换为 EGP 的阶层编码,这是本研究的目的。我们认为这一工作能够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综合以上,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分析标准职业信息转换为 EGP 阶层分类的原理机制的基础上,提供一个如何在 CGSS 数据中构建 EGP 阶层的操作化方法。对此,我们首先对 EGP 阶层框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在此基础上对职业信息转换为 EGP 阶层的原理进行了详细梳理,最后我们给出了完整的 SPSS 和 STATA 语法的转换步骤。

二、EGP 阶层框架的理论基础和构成

韦伯(1978)认为,不平等来源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的高低。戈德索普延续了该主张,认为决定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高低位置的关键因素是雇佣关系的差异,个人在组织中所具备的权威和权力,能够精确定位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根据他们的主张,阶层间的地位差异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1)是否拥有生产资料;(2)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是一种劳动契约性关系(Labour Contract),还是一种服务性关系(Service Relationships)。

首先,关于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他们分为了3种类型:第一是拥有生产资料,并且有能力购买劳动力的雇主(Employer);第二是拥有生产资料,但是没有余力去购买劳动力的自营业者(Self-employed Worker);第三是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给雇主的被雇者(Employee)。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由于被雇者占了总职业的8至9成,因此如何区分被雇者之间内部劳动力市场地位,是理解现代工业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对此,戈德索普等人认为,被雇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雇主与被雇者之间的关系是属于一种劳动契约性关系,还是一种服务性关系。他们认为劳动契约性关系通常指短期的雇佣关系,雇员单纯以工作时间或工作量为基准取得劳动报酬,雇主对这些雇员的监督较为容易,并且对这些雇员的依赖性较弱;而服务性关系则通常指长期的雇佣关系,雇员在科层制权威架构下拥有一定的权力或拥有雇主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雇主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性,不仅不容易对他们的工作表现进行监督,而且由于这些雇员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相对稀缺,不易从外部劳动力市场获得,因此对他们的依赖性较强。为保证组织能够更有效率地运行,雇主会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待遇和福利(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从以上来看,雇主与雇员之间是何种雇佣关系对被雇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具有重要影响。戈得索普把这种雇佣关系的生成原因归结于雇主在组织和制度环境下的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主要是基于在劳动过程中雇主对雇员监视的困难程度(Difficulty of Monitoring),以及雇员所具备的人力资本对雇主的可替代性(Specificity of Human Assets)(Goldthorpe, 2007)。

基于以上观点,戈德索普最终导出了以下10分类的阶层框架。首先,由于具有专业技术能力和管理权威的雇员与雇主建立的是一种服务性关系,因此在阶层结构中被置于上层地位(Class I + II);而由于从事销售和服务的低级常规非体力劳动者、技术体力工人和半技术体力工人与雇主建立的是一种劳动契约

① 具体命令为 iskoegp,命令的作者为 John Hendrickx。

性关系,因此在阶层结构中被置于相对较低的位置(Ⅲb+Ⅵ+Ⅶa)。由于那些从事行政和商贸领域的高级常规非体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监督者处于服务性关系和劳动契约性关系的中间位置,因此他们被置于阶层结构的中间位置(Ⅲa+Ⅴ)。最后,那些雇佣较少雇员的雇主、自营业者和自营农民,由于并不适用以上的雇佣关系,他们被统一划分为自营业者,置于专门技术雇员和无技术体力工人的中间位置(Ⅳa+Ⅳb+Ⅳc)。具体10分类的EGP阶层框架见下表。

表1 10分类的EGP阶层框架

1	I	Higher service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者、大企业的管理者;大资产所有者	服务关系
2	II	Lower service	较低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者;小型企业管理者	服务关系
3	III	Routine clerical(Ⅲa) / sales(Ⅲb)	行政、商业部门的非体力雇员;销售人员;其他服务业雇员	混合形式+ 劳动合同
4	IVa	Small employer	小资产者,自雇雇人	不适用
5	IVb	Independent	小资产者,自雇不雇人	不适用
6	IVc	Farmers / Farm managers	自营农民	不适用
7	V	Manual foreman	低级技术人员;体力雇员的监督者	混合形式
8	VI	Skilled manual	熟练技术型体力工人	劳动合同
9	VIIa	Semi-unskilled manual	半技术和非技术的体力工人	劳动合同
10	VII b	Farm workers	农业劳动者	劳动合同

三、EGP阶层框架的转换方法

从过往研究来看,EGP阶层分类的转换一般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各个国家所测定职业信息的基础上转换为EGP阶层分类,CASMIN项目主要基于这一立场来进行编码。由于各国职业信息不同,这导致转换过程没有一个标准化的程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甘泽博姆和特雷曼(1996)给出了第二种方法,即首先把各国的职业信息转换为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然后基于统一的编码规则再进行转换。这两个方法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更关注个人的雇佣关系,其编码规则不是标准化的;而后者更关注个人的职业信息,其编码规则是标准化的。由于第一种方法在CASMIN项目中并没有给出详细的编码过程,加上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国际比较的视角下对EGP进行转换,因此我们更倾向使用甘泽博姆和特雷曼的统一标准化的方法。

(一)数据选择

关于数据,我们选择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数据。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该调查每1至2年会全面地对中国社会、家庭和个人多个层次的信息进行收集,作为国内最早实施的全国性和综合性的学术调查项目,为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数据支持。第二,与其他数据不一样的是,该调查的职业信息变量使用了国际通用的标准职业编码,这是我们使用甘泽博姆和特雷曼转换方法的重要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之后的语法转换程序使用了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的数据,由于变量名称的改变,2010年和2015年的数据转换程序我们在最后进行了补充说明。关于样本选择,我们只选择了那些现在具有职业的被访者进行分析。

(二)转换方法

根据甘泽博姆和特雷曼的方法,ISCO 转换为 EGP 的过程需要经过 2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割,首先把 ISCO 职业小分类编码暂时转换为 EGP;第二个阶段是修正,通过调整雇佣关系和组织规模等条件,把第一阶段未准确转换为 EGP 的阶层进行再修正。尽管甘泽博姆和特雷曼对第一阶段的分割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并没有对第二阶段的修正处理给出具体分析。在 CGSS 数据中,由于如何进行第二阶段的修正处理较为复杂,因此,我们在下面详细对第二阶段的转换过程进行分析。

1. 分割阶段

按照甘泽博姆和特雷曼(1996,附表 A)给出的 ISCO 和 EGP 的对应关系,我们能够把 CGSS 数据中 ISCO 职业小分类转换为 EGP(见表 4)。转换完成之后,需要注意 3 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转换完成后的 10 分类的 EGP 阶层中只包含了阶层 1、2、3、7、8、9、10 和 11,而缺失了阶层 4、5 和 6。阶层 6 的缺失是由于阶层 3(Ⅲa)和阶层 6(Ⅲb)进行了合并。阶层 4(自营业主,自雇雇人)和阶层 5(独立自营,自雇不雇人)的缺失则需要第二阶段进行修正。第二个问题是,阶层 7 的人数过于稀少。这是因为在第一阶段中被转换的阶层 7,几乎都是从 ISCO 编码 3452 的 Armed Forces Non Commissioned Officers Foreman 职业中转换而来的,而这一阶层所包含的体力工人的监督者则需要第二阶段被修正。第三个问题是,农业阶层的人数过于稀少。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 CGSS 数据中,当问到被访者具体职业(问题 a59d)之前,会询问他们是否从事非农工作(问题 a58),如果回答从事务农工作的话,就会被直接跳过询问其具体职业,这导致了 ISCO 编码中农业劳动者非常少。为了防止农民样本流失,我们需要把那些回答务农的被访者定义为农民,在这一作业基础上再进行第二阶段的修正处理。

2. 修正阶段

在第二阶段,我们需要调整雇佣关系等条件,把第一阶段未正确转换为 EGP 的阶层进行调整。具体需要使用 8 个步骤和以下 4 个条件:(1)是否具有自营业身份;(2)是否具有管理地位;(3)ISCO 编码;(4)第一阶段生成的 EGP 编码。具体步骤见以下。

①常规非体力劳动者变更为下层服务阶层:在第一阶段被分割为【阶层 3】的常规非体力劳动者,如果具有【管理地位】(雇佣或管理 1 人以上)的话,变更为【阶层 2】^①。

②自营业主的生成:第一阶段被分割为【阶层 2】或者【阶层 3】的人员,如果具有【自营业】的身份,并且 ISCO 职业编码符合【(a)(b)(c)】^②的条件下,变更为【阶层 4】。在这里,(a)表示不足 10 人小企业的管理职位;(b)表示从事经营、贩卖、法务和税务等职业的专业人员;(c)表示从事事务、贩卖和服务业的人员。

① 在第一阶段被分割出来的常规非体力劳动者主要集中在 isco88 编码中 4000~5000(行政单位的办事人员)、5100~5120(商业部门的服务人员)以及 5200~5230(商业部门的销售人员)这一类。行政单位的办事人员包括了办公室文员、财会人员和档案管理员等职业;商业部门的服务人员包括了客服专员、金融机构出纳员、柜台职员、市场业务员、飞机与列车乘务员、博物馆向导等职业;商业部门的销售人员包括了售货员、模特、零售人员等职业。第一阶段被分割出来的常规非体力劳动者是较为粗糙的,因为这些人雇佣关系上可能是有差异的,需要根据管理和雇佣关系进行再修正。举例来说,办公室文员这一职业可能存在办公室主任和普通文员这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办公室主任由于具有管理地位,在职业地位上与普通职员是有差别的,这时需要把办公室主任调整为阶层 2。同理,在商业服务人员和商业销售人员中,也需要根据管理或雇佣上的地位差别进行再调整。举例来说,柜台出纳与柜台经理,列车员与列车长,商店店员与商店店长等。

②(a)ISCO 编码在 1310 到 1319 之间的[Small Enterprise]General Managers;(b)ISCO 编码在 3400 到 3439 之间的 Other Associate Professionals;(c)ISCO 编码在 4000 到 5230 之间的 Clerks 和 Service Workers and Shop & Market Sales Workers。

③独立自营的生成:第一阶段被分割为【阶层7】、【阶层8】和【阶层9】的人员,如果具有【自营业】的身份,并且是条件【(d)】^①之外的人员,变更为【阶层5】。(d)表示从事矿业、建筑业、制造业和运输业的劳动者。这意味着对那些从事矿业、建筑业、制造业和运输业的劳动者来说,即便是自营也没有被划入到独立自营阶层。

④技术体力劳动者变更为体力工人监督者:第一阶段被分割为【阶层8】的人员,如果具有【管理地位】(雇佣或管理1人以上)的话,变更为【阶层7】。

⑤农业劳动者变更为农业经营者:第一阶段被分割为【阶层10】的人员,如果具有【自营业】的身份,变更为【阶层11】。

⑥自营业主变更为独立自营:在以上步骤中被修正为【阶层4】的人员,如果不具有【管理地位】(雇佣或管理0人)的话,变更为【阶层5】。

⑦独立自营变更为自营业主:在以上步骤中被修正为【阶层5】的人员,如果具有【管理地位】(雇佣或管理1人以上)的话,变更为【阶层4】。

⑧上层服务人员的变更:以上被修正为【阶层2】、【阶层3】和【阶层4】的人员,如果具有较高【管理地位】(雇佣或管理10人以上)的话,变更为【阶层1】。

表2是我们对以上8个步骤进行再整理的内容。这里的(a)(b)(c)分别为步骤2中的(a)(b)(c), (d)为步骤3中的(d)。

表2 第二阶段EGP阶层的修正处理

步骤	修正前的EGP (第一阶段)	自营身份	雇佣或管理人数	约束条件	修正后的EGP (第二阶段)
1	常规非体力劳动者(Ⅲ)		1人以上		下层服务人员(Ⅱ)
2	常规非体力劳动者(Ⅲ)/下层服务人员(Ⅱ)	自营		(a)(b)(c)	自营业主(Ⅳa)
3	体力工人监督者(Ⅴ)/技术工人(Ⅵ)/非技术体力工人(Ⅶa)	自营		(d)	独立自营(Ⅳb)
4	技术工人(Ⅵ)		1人以上		体力工人监督者(Ⅴ)
5	农业劳动者(Ⅶb)	自营			农业经营者(Ⅳc)
6	自营业主(Ⅳa)		0人		独立自营(Ⅳb)
7	独立自营(Ⅳb)		1人以上		自营业主(Ⅳa)
8	下层服务人员(Ⅱ)/常规非体力劳动者(Ⅲ)/自营业主(Ⅳa)		10人以上		上层服务人员(Ⅰ)

四、EGP阶层分类的转换程序

根据上节的方法,我们在这一节使用SPSS软件给出了具体的转换程序。与甘泽博姆和特雷曼给出的10分类EGP阶层不同的是,我们给出了9分类EGP阶层。这是因为在中国社会,被雇的农业劳动者较少,大多数都是自营农民。因此,我们将农业劳动者和自营农民进行了合并。

①(d)ISCO编码在9300到9333之间的Laborers in Mining, Construction, Manufacturing and Transport。

正如我们上节所说,为了防止农民样本的流失,在进行转换之前,首先需要将农民层分离出来。表3给出了农民层分离的程序。表中的[a58]表示CGSS数据中问题a58,[@egp]表示我们要生成目标变量的名称。在这里,我们将回答现在正在务农的被访者定义为农民。

在农民层被分离出来之后,我们需要把ISCO职业信息转换为EGP阶层分类(第一阶段)。表3给出了这一转换过程。表3中的[IsCorp1]表示CGSS数据中职业信息的变量名称;[@isko]表示在第一阶段生成EGP的变量名称。由于转换量比较大,我们只给出了部分转换程序。具体可参照甘泽博姆和特雷曼(1996)论文中的附表A^①。

表3 ISCO88转换EGP的具体过程

农民层的分离	
COMPUTE @egp=a58. RECODE @egp(2 thru 3=1)(else=0).	
ISCO 编码转换为 EGP(第一阶段)	
COMPUTE @isko=iscorp1. RECODE @isko (1000=1)(1100=1)(1110=1)(1120=1)(1130=2)(1140=2)(1141=2)(1142=2)(1143=2)(1200=1) (9320=9)(9321=9)(9322=9)(9330=9)(9331=9)(9332=9)(9333=9) into @egp10.	
定义是否是自营业	
COMPUTE @semp1=a59a. RECODE @semp1(1 thru 2=1)(8=1)(else=0).	
定义是否具有雇佣或管理地位	
COMPUTE @sv1=a59aa. RECODE @sv1(0=1)(1 thru 9=2)(10 thru Highest=3)(else=0). COMPUTE @sv2=a59fa. RECODE @sv2(0=1)(1 thru 9=2)(10 thru Highest=3)(else=0).	
定义约束条件	
COMPUTE @abc=@isko. RECODE @abc(1300 thru 1319=1)(3400 thru 3439=1)(4000 thru 5230=1)(else=0). COMPUTE @d=@isko. RECODE @d(9300 thru 9333=0)(else=1).	
修正处理(第二阶段)	
if (@egp=3 and (@sv1>=2 or @sv2>=2))	@egp=2.
if (((@egp=2 or @egp=3) and @semp1=1 and @abc=1)	@egp=4.
if (((@egp>=7 and @egp<=9) and @semp1=1 and @d=1)	@egp=5.
if (@egp=8 and (@sv1>=2 or @sv2>=2))	@egp=7.
If (@egp=10 and @semp1=1)	@egp=11.
if (@egp=4 and (@sv1=1 or @sv2=1))	@egp=5.
if (@egp=5 and (@sv1>=2 or @sv2>=2))	@egp=4.
if (((@egp>=2 and @egp<=4) and (@sv1=3 or @sv2=3))	@egp=1.
EXECUTE.	

在进行第二阶段转换前,我们需要定义(1)是否是自营业;(2)是否具有管理地位;(3)约束条件。表3分别给出了具体程序,这里的[@semp1]表示是否为自营业的变量名称;[a59a]对应了CGSS数据中问题a59a。在这里,我们把回答自己是老板(=1);个体工商户(=2)和自由职业者(=8)的人员定义为自营业者。[@sv1]表示雇佣人数,[@sv2]表示管理人数。[a59aa]和[a59fa]分别对应了CGSS数据中问题

① 需要注意的是,甘泽博姆在网页<http://home.fsw.vu.nl/~ganzeboom/PISA/>公开了这一程序,但是与论文编码有一些差异。这里,我们完全按照论文的对应表进行了转换。

a59aa 和 a59fa。在这里,我们定义雇佣或管理 0 人 = 1; 1~9 人 = 2; 10 人以上 = 3。[@abc] 和 [@d] 分别表示我们之前定义的约束条件。最后为第二阶段 8 步骤的转换程序。需要注意的是,表 3 中各个步骤不能够调换顺序。基于以上各个修正步骤,我们给出了 2010—2015 年 CGSS 数据中 EGP 阶层分类的构成比例。具体见表 4。

表 4 CGSS 2010—2015 年 EGP 阶层 9 分类的结构比例 (%)

			2010	2011	2012	2013	2015
1	I	Higher service	9.1	8.3	8.2	9.3	8.7
2	II	Lower service	8.7	9.4	11.5	9.6	10.5
3	III	Routine clerical / sales	9.0	8.3	9.5	11.7	10.3
4	IVa	Small employer	5.0	3.0	4.9	3.7	4.1
5	IVb	Independent	7.8	7.0	4.8	6.6	6.2
6	V	Manual foreman	1.1	1.0	1.1	1.0	0.6
8	VI	Skilled manual	6.2	6.9	6.3	7.5	5.9
9	VIIa	Semi-unskilled manual	13.1	14.1	14.5	13.7	15.6
11	IVc	Farmers / Farm managers	40.0	42.1	39.3	36.7	38.1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样本量			7448	3610	7436	7050	6068

注:(1)阶层 10 和阶层 11 进行了合并;(2)样本只包括现在具有职业的被访者。

转换过程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在家族企业中工作的非管理人员是定义为自营业者还是被雇者的问题。如果按照家族企业继承的角度来说,应该被定义为自营业者,如果从职责和收入分离,以及继承不确定性的角度来说,应该被定义为被雇者。在这里,本研究按照戈德索普等人的方法,将他们定义为被雇者。以后的研究可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来定义他们的归属。第二,以上给出的 spss 语法程序仅适用于 CGSS2011—2013 年的数据。在使用 2010 年数据时,需要把语法程序中的 [iscorp1] 改为 [ris-co881]。在使用 2015 年数据时,不仅需要把 [iscorp1] 改为 [a59disco88],还需要把 [a59aa] 和 [a59fa] 分别改为 [a59a1] 和 [a59f1]。第三,本研究主要对被访者现在的职业进行转换,没有对被访者过去的职业和父代职业进行转换,如果需要该语法程序,可向作者索取。

五、总结与讨论

在社会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中,EGP 是最常用的阶层分类。EGP 阶层分类的转换机制是什么,如何把中国 CGSS 数据中的标准职业分类直接转换成国际比较可能的 EGP 阶层分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当前的国内研究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讨论。对此,本研究基于甘泽博姆和特雷曼的方法,给出了具体的转换方法,不仅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支持,也对社会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比较可能的标准化阶层分类方法。

近年来,东亚社会流动(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比较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有田伸, 2009; 石田浩、三轮哲, 2009),一些学者甚至开始致力于探究东亚社会的阶层模型(Kazuto, 2011)。这是因为,东亚社会的工业化进程都是建立在自营农民的解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迅速扩大的教育机

会基础之上,因此形成了东亚社会较为相似的阶层结构。2005年,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实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SSM)调查中,阶层框架使用了国际统一标准化的CASMIN项目的EGP阶层分类方法,包括了职业类别(ISCO88)、雇佣形态(自营、自雇和被雇)和企业规模(未满30人、30-300人、300人以上)。该调查及后来的研究报告(Dynamic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East Asia 2005)共同构建了一个实质的、体系的东亚阶层研究框架。从2006年开始,平均每2年实施一次的东亚综合社会调查(EASS)成为东亚社会比较研究的重要数据。该数据包括了中国(CGSS)、日本(JGSS)、韩国(KGSS)和中国台湾地区(TSCS)的社会调查。需要指出的是,与SSM调查不同的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中,阶层测量并没有统一标准化。如何将其转换为比较可能的东亚EGP阶层框架,是未来研究的重要工作,也是本研究的重要目的。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东亚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有巨大潜力,这对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特征和社会不平等的现状和趋势是非常有益的。

近年来,随着欧洲部分国家逆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社会进程,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其最大特征是体力劳动者的减少和服务业劳动者的扩大(Oesch and Menés,2011; Autor and Dorn,2013)。由于传统EGP的阶级图式是建立在制造业能够提供安定雇佣和丰厚报酬的工业社会基础之上的,因此EGP的阶级框架并没有明确区分体力劳动者与非熟练服务业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在逆工业化社会的新背景下,一些学者认为EGP的阶级图式需要进一步修正,以适应体力劳动者与服务业劳动者之间此消彼长的结构变化(Esping-Andersen,1993; Oesch,2006)。这其中,奥谢(Oesch,2006)的阶级图式受到广泛关注。该阶级图式最重要的特征是将被雇者在不同领域的工作逻辑(Work Logic)纳入到阶级框架之中。奥谢认为,不同领域的工作逻辑不仅决定了个人的劳动条件,也影响着个人的意识及行动,因此在不同工作环境和生产单位下的雇佣关系是异质性,而非EGP框架视为的同质性关系。他根据一个职业是否涉及技术专长、组织权力的管理和满足个人需求的服务,将工作逻辑分为技术领域的工作逻辑(Technical Work Logic)、组织领域的工作逻辑(Organizational Work Logic)和服务领域的工作逻辑(Interpersonal Service Work Logic)。同时,在不同工作逻辑之下,按照工作技能的市场价值(专业/管理的技能、准专业/管理的技能、一般的/职业的技能、非熟练/单调劳动)进行了纵向切割。在具体分类过程中,该阶级图式延续了EGP框架的理论基础,积极纳入了雇佣关系和组织规模的影响,生成了17个不同的职业阶层类别(Oesch,2006:269)。奥谢使用该阶级图式对西欧四国的实证分析发现,该图式除了能够更准确地反映非熟练服务劳动者的阶层位置,更好地预测对收入和晋升前景的影响之外,也能够更好地把握不同工作逻辑间对政党支持和工会参与的倾向差异。以上EGP阶层框架的后续进展对中国未来的阶层分析是有益的。尽管中国还没有进入到后工业化的社会阶段,但是在工业化和市场转型的现阶段,非熟练服务业劳动者群体开始迅速扩大,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如何将他们的职业地位进行更加合理的归类,是未来国内研究者重点观察的问题之一。

最后,本研究的目的是不是要建立一套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阶层分类,而是生成一个能够进行国际比较的标准化EGP阶层分类。因此,该阶层分类是否与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相一致是本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中国社会越来越强调雇佣关系对阶层分化的影响力,但是中国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因素和组织的所有制性质也不能忽视(秦广强,2011;刘欣,2018)。因此我们建议研究者在进行阶层分类时,应该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进行恰当地分类。而如何在EGP阶层框架的基础上加入中国社会的特点,需要以后进一步探讨。

附表 stata 软件的转换程序

```
/*ISCO 编码转换为 EGP(第一阶段)*/
recode iscorp1 (1000/1120=1) (1130/1143=2) (1200/1220=1) (1221=11) (1222/1239=1) (1240=2) (1250/1251=1) (1252/1310=2) (1311=11)
(1312/1319=2) (2000/2131=1) (2132/2139=2) (2140/2147=1) (2148=2) (2149/2229=1) (2230/2300=2) (2310=1) (2320/2340=2) (2350/2352=
1) (2359=2) (2400=1) (2410=2) (2411=1) (2412=2) (2419=2) (2420/2429=1) (2430/2432=2) (2440/2443=1) (2444=2) (2445=1) (2446/2460=2)
(3000/3142=2) (3143/3144=1) (3145/3229=2) (3230/3232=3) (3240/3242=2) (3300/3340=3) (3400/3429=2) (3430=3) (3431/3432=2) (3430=
3) (3431/3432=2) (3433=3) (3434=2) (3439=3) (3440/3451=2) (3452=7) (3460=3) (3470/3475=2) (3480=3) (4000/4141=3) (4142=9) (4143/
4223=3) (5000/5120=3) (5121=2) (5122=8) (5123/5130=9) (5131=3) (5132=9) (5133=3) (5139=9) (5140/5141=8) (5142=9) (5143=8) (5149=9)
(5150/5152=2) (5160=9) (5161/5162=8) (5163=9) (5164=8) (5169=9) (5200/5230=3) (6000/6130=10) (6131/6133=11) (6134/6154=10) (6200/
6210=11) (7000=8) (7100/7113=9) (7120=8) (7121/7123=9) (7124/7130=8) (7131=9) (7132/7134=8) (7135=9) (7136/7141=8) (7142/7143=9)
(7200/7233=8) (7234=9) (7240/7313=8) (7320/7322=9) (7323/7324=8) (7330/7332=9) (7340/7420=8) (7421=9) (7422/7423=8) (7424=9)
(7430=8) (7431/7432=9) (7433/7500=8) (7510=7) (7520=8) (7530=9) (8000/8143=9) (8150/8172=8) (8200/8310=9) (8311=8) (8312/8330=9)
(8331=10) (8332/8333=8) (8334/8400=9) (9000=9) (9100/9113=3) (9120/9200=9) (9210/9213=10) (9300/9333=9) (9999=.), gen(EGP)
/*定义是否是自营业*/
recode a59a (1/2=1)(8=1)(else=0),gen(sempl)
/*定义是否具有雇佣或管理地位*/
recode a59aa(0=1)(1/9=2)(10/max=3)(else=0),gen(sv1)
recode a59fa(0=1)(1/9=2)(10/max=3)(else=0),gen(sv2)
/*定义约束条件*/
recode iscorp1(1300/1319=1)(3400/3439=1)(4000/5230=1)(.)(else=0),gen(abc)
recode iscorp1(9300/9333=0)(.)(else=1),gen(d)
/*修正处理(第二阶段)*/
replace EGP=2 if (EGP==3)&(sv1>=2|sv2>=2)
replace EGP=4 if (EGP==2|EGP==3)&(sempl==1)&(abc==1)
replace EGP=5 if (EGP>=7 & EGP<=9)&(sempl==1)&(d==1)
replace EGP=7 if (EGP==8)&(sv1>=2|sv2>=2)
replace EGP=11 if (EGP==10)&(sempl==1)
replace EGP=5 if (EGP==4)&(sv1==1|sv2==1)
replace EGP=4 if (EGP==5)&(sv1>=2|sv2>=2)
replace EGP=1 if (EGP==2|EGP==3|EGP==4)&(sv1==3|sv2==3)
/*农民层的分离*/
replace EGP=11 if (a58==2 | a58==3)
/*注:以上适用于 CGSS2011—2013 年的数据。CGSS2010:[iscorp1]改为[riscorp881]。CGSS2015:[iscorp1]改为[a59disco88];[a59aa]和
[a59fa]分别改为[a59a1]和[a59f1] */
```

参考文献:

- 李路路, 2006,《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强, 2011,《社会分层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林宗弘、吴晓刚, 2010,《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社会》第6期。
- 刘欣, 2007,《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第6期。
- , 2018,《协调机制、支配结构与收入分配:中国转型社会的阶层结构》,《社会学研究》第1期。
- 陆学艺, 2010,《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秦广强, 2011,《新韦伯主义阶级框架:起源与演变、操作与理论》,《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
- 朱妍, 2011,《新韦伯主义的阶层分类框架适用于中国吗?——戈德索普的阶层理论述评》,《社会学》第2期。
- 石田浩、三輪哲, 2009,「階層移動から見た日本社会—長期的趨勢と国際比較」,《社会学評論》第4期。
- 有田伸, 2009,「比較を通じてみる東アジアの社会階層構造—職業がもたらす報酬格差と社会的な不平等」,《社会学評論》第4期。
- Autor, David H., and David Dorn. 2013. "The Growth of Low-skill Service Job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5):1553–1597.
- Esping-Andersen, G. 1993. *Changing Classes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London Newbury Park, Cali-

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Ganzeboom, Harry B. G., R. Luijkx, and D. J. Treiman. 198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8:3–84.

Ganzeboom, Harry B. G., Paul M. De Graaf, and D. J. Treiman. 1992.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1(1):1–50.

Ganzeboom, Harry B. G. and D. J. Treiman. 1996.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Measure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for the 198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3): 201–239.

Erikson, Robert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Erikson, Robert, John H. Goldthorpe and Lucienne Portocarero. 197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0(4):415–441.

Goldthorpe H. John. 2007. *On Sociology: Numbers, Narrativ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ldthorpe H. John and Hope Keith. 1974. *The Social Grading of Occupations: A New Approach and Sca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oldthorpe H. John and Llewellyn C. 1977. "Class Mobility in Modern Britain: Three Theses Examined." *Sociology* 11(2):257–287.

Grusky, David and Robert M. Hauser. 1984.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Revisited Models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Sixteen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1):19–38.

Grusky David B. 2001.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David B. Grusk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51.

Kazuto Misumi. 2011. *Study of an East Asian Stratification Model, Grant-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B)*.

Oesch, Daniel. 2006. "Coming to Grips with a Changing Class Structure: An Analysis of Employment Stratification in Britain, Germany, Sweden and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1(2):263–288.

Oesch, Daniel and Menés, J. R. 2011. "Upgrading or Polarization? Occupational Change in Britain, Germany, Spain and Switzerland, 1990–2008." *Socio-Economic Review* 9(3):503–531.

Yamaguchi, K. 1987. "Models for Mobility Tables: Toward Parsimony and Subst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4):482–494.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 Oper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Classification Using EGP: Based on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Data

HOU Li-ming QIN Guang-qiang

Abstract: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mobility studies, Erikson and Goldthorpe's class categories (EGP)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asure in classification. How to convert Chinese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in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to make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a complex question which hasn't been clearly discussed within Chinese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method proposed by Ganzeboom and Treiman, this study provides an conversion procedure both in theory and program. This stud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supporting future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social mobility model and the West.

Key words: Class Categories; Class Conversion; Conversion Program; EGP; ISCO88

(责任编辑:朱斌)